上海博物馆藏
云冈石窟造像残件整理

师若予

内容提要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批云冈石窟造像残件。这批残件是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考察队于 1940 年在昙曜五窟内、外平整地面时所采集的众多造像残件中的一部分，多数收录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编著的《云冈石窟》第十四卷图录中。据作者研究，水野等人于日本战败前将他们在云冈石窟采集的部分造像残件，以及万安北沙城、阳高古城堡汉墓出土的部分文物带回日本，藏于东方文化研究所中。抗战胜利后，这批文物中的一部分经李济先生等人的努力，于 1948 年被成功追索回国，并于 1955 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关键词　云冈石窟　东方文化研究所　李济　文物归还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云冈石窟造像残件16件，其中12件刊载于《云冈石窟》[1]第十四卷中，13件背面有墨书洞窟号码，均为昙曜五窟的窟号，应是当年日本人在考察云冈石窟时所标记的[2]。在被日本人回填后又于近年被云冈考古工作者重新发掘出土的造像残件背面也有同类墨书号码[3]，可知上海博物馆藏云冈造像残件背面墨书号码的成因与此相同，为1939年至1940年发掘昙曜五窟内、外地面的日本人所书写。以下对这批造像残件的现状和流传经过作一初步梳理和研究。

一　造像残件概述

现已整理出16件上海博物馆藏云冈造像残件（其中12件被《云冈石窟》第十四卷刊载），列表如下[表一]。

‹1›　[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以下简称《云冈石窟》）第十四卷，图版50、51、54、56，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雲岡刊行會，1954年。

‹2›　[日]岡村秀典：《雲岡石窟・遺物篇》页21－23，朋友書店，2006年。

‹3›　员小中、王雁翔：《久别重逢的石雕：云冈石窟窟前出土的几件石雕找到了位置》，《敦煌研究》2016年第2期。

［表一］上海博物馆藏云冈石窟造像残件基本信息

序号	名称	高（厘米）	宽（厘米）	最厚处（厘米）	质地	是否收录[1]	图录编号	背面墨书	补充
1	佛头残件〔图一：1、2〕	21.5	12	9.5	砂岩	是	PL.50F〔图一：3〕	十七洞	清理于第17窟。佛头实物缺失右脸下半部并断裂为三块，与PL.50F的断裂一致。佛头双目细长为云冈第二期造像风格。
2	天人头部残件〔图二：1、2〕	23.4	15.3	5	砂岩	是	PL.50B〔图二：3〕	十七洞	清理于第17窟。天人脸型丰满，鼻梁挺直，为云冈第一期造像。
3	天人头部残件〔图三：1、2〕	21.6	15	4.5	砂岩	是	PL.50C〔图三：3〕	十七洞/十七洞	清理于第17窟。造像从眼睛下方横向断裂为两块，断裂位置与PL.50C一致。
4	天人头部残件〔图四：1、2〕	16.2	10	5.2	砂岩	是	PL.50D〔图四：3〕	第十七洞明窗	清理于第17窟明窗处。从右眼角到头顶中央残缺，与PL.50D残缺部位一致。
5	天人头部残件〔图五：1、2〕	28.4	15.6	6.5	砂岩	是	PL.50E〔图五：3〕	十六洞南面	清理于第16窟南面。
6	供养菩萨头部残件〔图六：1、2〕	12.1	7.8	5.8	砂岩	是	PL.50G〔图六：3〕	十七洞明窗	清理于第17窟明窗处。
7	供养天人头部残件〔图七：1、2〕	12.3	6.5	4	砂岩	是	PL.50H〔图七：3〕	十七洞	清理于云冈第17窟。
8	供养天人头部残件〔图八：1、2〕	9.8	5.2	3	砂岩	是	PL.50I〔图八：3〕	十七洞	其中“洞”字剥蚀，表明此残件清理于云冈第17窟。
9	供养天人头部残件〔图九〕	9.8	4.9	3.9	砂岩	否		无墨书	据馆藏文物档案可知此残件与其他15件残件均为1955年1月5日，由上海市文化局拨交上海博物馆的日本归还文物。且材质、题材和造型风格与第7、8两件残件相同，故予以收录。
10	供养天人胸部残件〔图十：1、2〕	15.5	19.8	3	砂岩	是	PL.51D〔图十：3〕	十七洞	清理于云冈第17窟。
11	供养天人头胸部残件〔图十一：1、2〕	16	19.5	12.5	砂岩	否		二十洞	清理于云冈第20窟。
12	千佛残件〔图十二：1、2〕	37.5	34	9.5	砂岩	是	PL.54D〔图十二：3〕	十六洞明窗	采集于云冈第16窟明窗处。
13	背光残件〔图十三：1〕	12	10.5	5.6	砂岩	是	PL.54F〔图十三：2〕	无墨书	据《出土断石》条目记载，此残件石材微带青色，质地细腻，为昙曜五窟前采集的，原来所在不明。外层为火焰纹，内层为坐佛[2]。
14	狮子头部残件〔图十四：1、2〕	11	13.4	10	砂岩	是	PL.56F〔图十四：3〕	十七	清理于云冈第17窟。墨书剥蚀严重。在第17窟云冈二期较晚阶段补凿小龛的底座两侧有类似的狮子。
15	手部残件〔图十五：1、2〕	21	11	8.5	砂岩	否		十七洞明窗/十七洞明窗	采集于云冈第17窟明窗处。

‹1› 此处指是否收录于《云冈石窟》第十四卷中。

‹2›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页85。

序号	名称	高（厘米）	宽（厘米）	最厚处（厘米）	质地	是否收录[1]	图录编号	背面墨书	补充
16	建筑残件〔图十六：1、2〕	12.1	7.8	5.8	砂岩	否		无墨书	据馆藏文物档案可知此残件与其他15件残件均为1955年1月5日，由上海市文化局拨交上海博物馆的日本归还文物，故予以收录。残件正面有三个斗拱，斗拱剥落，其间有供养天人半身像。侧面斗拱及天人较清晰，斗拱之上有瓦檐。

二　造像残件的出土、采集情况整理

据《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出土断石》记载，图录中的残件选自1939、1940年平整云冈石窟地面时所收集残件中的一部分。当时这些残件存放在第6窟前的西客殿中，日本人还未对其作仔细整理，调查便被迫中断了。当长广和水野编写报告时，手头只有部分未整理残件的照片，其中除几件有明确的出土和采集地点外，其他残件均地点不明[1]。以下结合《云冈石窟》中的相关记载，以及上海博物馆藏云冈造像残件背后的墨书，对这批造像残件的出土和采集情况作一梳理。

〔图一:1〕佛头残件（正面）



〔图一:2〕佛头残件（背面）



〔图一:3〕佛头残件旧照
采自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F，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云冈刊行会，1954年



〔图二:1〕天人头部残件（正面）



〔图二:2〕天人头部残件（背面）



〔图二:3〕天人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B



据《云冈石窟》第十五卷中《云冈发掘记2》记载，1939年9月和1940年9、10、11月间，日本云冈调查队在对昙曜五窟窟前地面进行平整的同时，展开了考古发掘。调查队于1940年夏秋两季，对第16至20窟即昙曜五窟进行清理工作。自1940年7月23日至31日，调查队清理了第17窟的地面，出土了若干石刻残件，其中有佛头一件，但不确定这些残件原来是否都属于第17

[1]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页84－85。

〔图三:1〕天人头部残件（正面）



〔图四:1〕天人头部残件（正面）



〔图五:1〕天人头部残件（正面）



〔图六:1〕供养菩萨头部残件（正面）



〔图三:2〕天人头部残件（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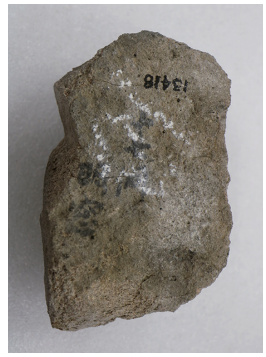
〔图四:2〕天人头部残件（背面）



〔图五:2〕天人头部残件（背面）



〔图六:2〕供养菩萨头部残件（背面）



〔图三:3〕天人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C



〔图四:3〕天人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D



〔图五:3〕天人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E



〔图六:3〕供养菩萨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G



〔图七:1〕供养天人头部残件（正面）



〔图七:2〕供养天人头部残件（背面）



〔图七:3〕供养天人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H



〔图八:1〕供养天人头部残件（正面）



〔图八:2〕供养天人头部残件（背面）



〔图八:3〕供养天人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0I



〔图九〕供养天人头部残件（正面）



〔图十:1〕供养天人胸部残件（正面）



〔图十:2〕供养天人胸部残件（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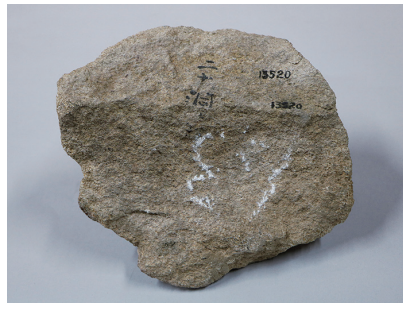
〔图十:3〕供养天人胸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1D



〔图十一:1〕供养天人头胸部残件（正面）



〔图十一:2〕供养天人头胸部残件（背面）



〔图十二:1〕千佛残件（正面）



〔图十二:2〕千佛残件（背面）



〔图十二:3〕千佛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4D



〔图十三:1〕背光残件



〔图十三:2〕背光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4F



〔图十四:1〕狮子头部残件（正面）



〔图十四:2〕狮子头部残件（背面）



〔图十四:3〕狮子头部残件旧照
采自《云冈石窟》第14卷，图录编号PL.56F



〔图十五:1〕手部残件（正面）



〔图十五:2〕手部残件（背面）



〔图十六:1〕建筑残件（正面）



〔图十六:2〕建筑残件（侧面）



窟[1]。本文中的第1、2、3、4、6、7、8、10、14、15号上海博物馆藏云冈造像残件背面墨书洞窟号码均为十七洞，即第17窟。故这10件造像残件应该是1940年7月23日至31日间，调查队清理第17窟时所得。其中第4、6、15号残件背后墨书表明，调查队对第17窟明窗也进行了清理。

第17窟明窗两侧多雕凿云冈二期小龛像，第4号残件与此类小龛中的供养菩萨风格接近，或为其中脱落者。《出土断石》条目描述第6号残件为戴宝冠的小型供养菩萨，在第16窟明窗的佛龛中也有类似的

‹1› 《云冈石窟》第十五卷，页91、185。

供养者‹1›。第6号残件脸部下方及冠顶残缺，与PL.50G残缺部位完全一致。第17窟明窗两侧多雕凿云冈二期小龛像，第6号残件与此类小龛中的胁侍菩萨风格接近，或为其中脱落者。《出土断石》条目描述第7号残件为小型供养天人头部，在第十六窟明窗两侧佛龛内也有类似的天人供养者‹2›。同样在第十七窟明窗两侧也多凿有云冈第二期的小龛像。第15号残件手部之下为大腿的一部分以及座前狮子头顶的圆形突起部分，可见腿面上弧线状的阴刻衣纹。第17窟明窗东侧太和十三年上龛交脚菩萨像的左手手势以及下方狮子头顶的圆形突起与此残件一致。这件手部残件可能属于17窟明窗侧壁上某龛云冈第二期的交脚菩萨像。

自1940年9月25日至11月26日，由日比野丈夫、小野胜年两人主持完成的昙曜五窟窟前平整及清理工作，出土了大量石刻残件‹3›。本文第5号残件背后墨书“十六洞/南面”，第12号残件背后墨书“十六洞明窗”，这两件残件应该是此间于第16窟采集或发掘的。其中第12号残件《出土断石》条目称采集于昙曜五窟前‹4›，但据背后墨书可知条目中关于采集地点的记载不够精确。此残件的风格与第16窟明窗两侧的千佛相同，雕凿于云冈第二期的较晚阶段‹5›。残件背面有凿痕，而第16窟明窗东侧中上部外侧的缺失处也有凿痕，故此残件或是从该处凿下的。本文第11号残件背后墨书“二十洞”，是在第20窟前出土的。第20窟以主尊乳部为界，岩层明显分为上层黄色砂岩与下层紫红色砂岩两层。因紫红色砂岩质地软弱，造成第20窟西壁在第一期西壁胁侍佛完成不久就开始坍塌‹6›。第11号残件的质地为黄色砂岩，第20窟西壁胁侍佛背光上方胡跪供养菩萨头顶的小型供养天人与此残件造型相似。此胡跪供养菩萨外侧有个二佛并坐龛，龛像大部分已崩塌，在此二佛并坐龛右侧崩塌处，原来应有一身胡跪供养菩萨，其躯干现已找到‹7›。第11号残件或是第20窟西壁上部某尊大型供养菩萨头顶脱落的小型供养天人。

三　造像残件等的流传

上海博物馆藏16件云冈造像残件属于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文管会）接收日本归还文物中的一部分。市文管会于1949年9月接收一批日本归还文物，主要是由华东区贸易总公司储运处接管

‹1›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页85。

‹2›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页85。

‹3›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五卷，页91、185。

‹4›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三卷、第十四卷，页85。

‹5› 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文物》1994年第10期。

‹6› 前揭杭侃《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

‹7› 前揭员小中、王雁翔《久别重逢的石雕：云冈石窟窟前出土的几件石雕找到了位置》。

的存放在原中央信托局(黄浦码头)仓库内的物品，计有475箱[1]。市文管会于1950年将整理结果检同清册报请上海市人民政府备案。遵奉上海市政府转发中央政务院指示，市文管会保持其原状以备将来向美、日清算时做物证之用。直到1954年，为避免文物日久损坏，市文管会再次就这批文物的处理问题拟具报告请示上海市政府，市政府于同年8月24日(54)沪府文字第3327号批复：已转呈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8月5日(54)政文习字第48号批复，同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提《关于处理日本归还文物问题的报告》中的处理原则，组织联合处理机构对上述文物等进行鉴别处理[2]。

据上海博物馆档案《关于处理日本归还与赔偿文物经过情况的报告》记载，1954年9月9日，市文管会及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市文化局(并代表文委)、市财政局、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召开筹备会议，成立处理日本归还文物委员会(以下简称处理委员会)，推举市文管会徐森玉副主任为主任委员。处理委员会下设图书鉴别小组、古物鉴别小组和处理小组，在历时五个多月的工作后，市文化局、上海博物馆派人于1955年1月5日赴市文管会仓库，照所选定之物分别提取日本归还文物中的古物部分，并办理签收手续。

据《上海博物馆领到上海市文化局拨交由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转拨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中一部分文物清单》记载，在这批拨交给上海博物馆的日本归还文物中，除云冈石佛断片外，还有云冈台上残瓦片、云冈西部台上瓦当、张家口万安北沙城汉墓土器壶碗残片、张家口万安北沙城汉墓土器、阳高县出土汉纸片(实系纱与绢)、阳高县出土汉漆器碎画片等。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日本归还文物中的云冈文物与1939至1940年水野清一等人对云冈昙曜五窟及云冈台上佛寺遗址的发掘记录一致[3]，表明这些文物是其清理、发掘所得。其中上海博物馆藏云冈西部台上瓦当中有多件北魏“传祚无穷”铭文瓦当，这种瓦当在1940年10月30日至11月22日小野胜年、日比野丈夫等人对云冈西部台上北魏寺院遗址进行发掘时多有出土[4]。上海博物馆所藏者是此次出土瓦当中的一部分，剩余部分收藏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为其前身)[5]。

据《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记载，1946年李济、张凤举两委员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工作。李委员返国后拟另请徐森玉委员继续赴日。李济先生于此次会议上作赴日工作报告，其于1946年3月31日离沪当日抵东京，计留居日本33日，于京都参观住友、友成及东方文化研究所等六处[6]。又据《中国驻日代表团视察被日本劫掠物资仓库的报告》记载，中国驻

‹1›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文物博物馆志》页374、375，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 上海市人民政府档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复(54)沪府文字第3327号》、《召开会议关于处理日本归还文物》，案卷号211。

‹3›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五卷，页91—98。

‹4› 前揭《云冈石窟》第十五卷，页97。

‹5› 前揭《雲冈石窟・遺物篇》，页35、36。

‹6›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记录》，全宗号5，卷号11682(2)。

日代表团成员于1947年5月6日参观了设立被劫物资仓库的京都博物馆，该馆所列劫物多系古玩及张家口出土之残片。在该报告所附盟军总部提供的制成于1947年4月20日的京都博物馆储藏的劫掠物资英文目录中，第257号为“object for antisuarians”即古文物，附注有“5 Bags and some fragmengts fragments”即五个袋子和一些碎片数目为16、4、7、30、10件[1]。该报告中提到的作为劫物储藏于京都博物馆的张家口出土之残片，当是1941年9至11月间水野清一等人组成的万安调查队发掘张家口万安北沙城汉墓时出土的碎片，以陶器残片为主。

可知自1946年3月至4月间，李济先生赴日于东方文化研究所追索的这批由水野等人在云冈、阳高和张家口万安北沙城汉墓获得的文物中的部分，至1947年4月20以前已被盟军总部饬令日方自东方文化研究所转移至设在京都博物馆的被劫物资仓库中。据上海博物馆藏品档案记载，上海博物馆藏云冈石窟造像残件以及阳高、张家口万安北沙城出土的文物都是1948年日本归还的文物，可知抗战胜利后在李济先生等人努力下，这批文物被从日本追回中国了。

四　结语

据本文研究，1939年9月及1940年9至11月间，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小野胜年等人对云冈石窟的昙曜五窟，及窟顶台上寺院遗址等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大量佛教造像残件及瓦当、瓦片等文物。水野等人将部分云冈造像残件及瓦当、瓦片等文物，连同1941年发掘的万安北沙城汉墓和1942年发掘的阳高古城堡汉墓所获部分文物，于抗战结束前带回日本，藏于东方文化研究所。1946年3、4月间，李济先生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损失委员会委托，赴日调查抗战期间日本掠夺我国文物事宜，并专访东方文化研究所，成功追回其所藏部分水野等人在山西大同及周边地区采集、发掘的文物。而徐森玉先生本来是要接替李济先生赴日继续追索日本战时劫掠文物的，但因时局变化未能成行。1954年徐先生主持了这批日本归还文物的处理工作。这批文物于1948年被成功追索回国后，于1955年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由这批文物存放于原中央信托局（黄浦码头）仓库可知，这批文物应该是由原轮船招商局的船只或相关国外船只自日本运回上海并交由原中央信托局储运处点收的[2]。具体运回日期和轮船名称待考。

［作者单位：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

（责任编辑：何　芳）

‹1›　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档案《中国驻日代表团视察被日本劫掠物资仓库的报告》，全宗号20(2)，卷号494。

‹2›　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一辑《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页111－113，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